

“民国作家”关于“日记文学”的争议探析

刘 中 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围绕“日记文学”的相关话题,郁达夫、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人为代表的民国作家展开了多年的争鸣和讨论,初步建构了他们关于“日记文学”的理论。真中见真和尽有文艺的趣味是日记文学的两大特征。日记能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学分支,与作者对社会的观察视角、记录内容、叙写目的、主体素养等有极大关联。读者爱读日记,主要是源于他们好奇的天性和趣味的追求;就具体情况言,古今读者有较大区别。

关键词:郁达夫;鲁迅;民国作家;日记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2-0046-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200

一、民国时代的日记热潮

民国时期出现了我国日记文学的又一高潮。此时,无论日记写作,还是日记文论,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理论方面,作家郁达夫在我国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日记文学”概念,并指它属于真正的日记(不包括以日记的体裁做的小说等作品),是正统文学之外的一个宝藏^[1]。此外,周作人的《日记与尺牍》,郁达夫的《日记文学》《〈日记九种〉后叙》《再谈日记——〈达夫日记集〉代序》《有目的的日记》,鲁迅的《怎么写——夜记之一》《马上日记·豫序》《马上支日记·前言》《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施蛰存的《我的日记》,及林语堂的《冰莹〈从军日记〉序》、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前言》等,都是此期作家比较重要的日记文论。

写作方面,此时许多作家都写有日记,数量之巨、种类之多,是极惊人的。其中,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堪称南宋陆游《入蜀记》后的又一日记力作,当时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他的小说成名作《沉沦》。这是一部书写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极具“小说味”的写实日记,它的成功引发了民国时期的日记文学热。鲁迅的《马上日记》《马上日记之二》《马上支日记》也堪称日记文学力作,这些日记被排除在《鲁迅日记》之外,编进了鲁迅的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中。笔者以为,这是颇具“杂文味”的新体日记。此外,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自1927年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后,一版再版,连续出了十九版,还相继经林语堂、汪德耀翻译为英文和法文,在西方世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笔者以为,这是颇具“报告文学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刘中黎(1970—),男,湖南武冈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各体文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等。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日记文献辑校与中国日记文学理论建构研究”(14XZW026)。

味”的新体日记。

据施蛰存所言,新文学中日记开始被人重视,首先应该推源于周作人的小文《日记与尺牍》;但民国作家之记日记,乃至成为热潮,当推《时事新报·学灯》《世界日报·副刊》《语丝》《论语》《中央日报·副刊》,以及北新出局、春潮书局等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书局等喜欢刊登或出版作家的日记佳作^[2]。此外,郁达夫、鲁迅、谢冰莹等人的日记文学实践取得了极大成功,也是此期日记文学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民国作家的日记文学认同

民国作家认为:真中见真和尽有文艺的趣味,是日记文学的两大特征。

真实性是民国作家的文学追求,对于如何确立文学的真实性,郁达夫和鲁迅颇有一些分歧。在郁达夫看来,文学作品一般都有作者自叙传的色彩,作者以第三人称写的作品,时常有不自觉地误用第一人称的时候,如果这时叙述作品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就可能给读者留下“何以这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被作者晓得这样精细”的质疑,于是文学的真实性就可能在读者心中消失。日记可以解除这个担忧,因为日记是散文中最便当的体裁。所谓“便当”,是指该体裁的书写视角是“第一人称”,便于作者以“我”的身份进入作品主人公的心理,自由地书写其心理状态,却不让读者产生“何以这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被作者晓得这样精细”的质疑,从而避免日记这种散文类文学作品给人留下“不真实”的阅读感和艺术破绽^[1]。此外,“便当”也是指日记的取材范围广、形式自由,可以被写成有始有终的记事文,也可以被写成小品文、感想文、批评文^[1]。郁达夫认为,日记的这些特征,在满足读者对真实性的确立方面,比第一人称的正统文学(如小说、诗歌等)更有凭籍和把握^[2]。

对于郁达夫欲借“日记”的文体形式来确立文学真实性的企图,鲁迅是反对的。他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指出:日记不但在体式上应该以“真”为本,内容上也要力求“见真”,即真中见真;而文学是虚构的艺术,文学作品确立真实性的途径一般是“假中见真”,即通过虚构来达到情理逻辑的真实,这是“艺术真实”,即使形式上有些破绽原也无妨;他批评《林黛玉日记》之类打着日记之“真”形来装腔的文本,指责它们是“真中见假”的伪日记;让读者对真实性产生质疑的,不是文学的“假”,而是日记的“真中见假”^[3]。对于鲁迅的批评,郁达夫1935年在《再谈日记——〈达夫日记集〉代序》中表示了认可。

1929年,林语堂为单行本《从军日记》作序,也肯定了日记的特征在于真中见真。《从军日记》的作者是谢冰莹,她作为中央军校(以前叫黄埔军校)女生被选拔为第一批救护队员,到鄂西前线直接参与了北伐战争。《从军日记》是战地日记,记录了作者参与这场战争的所见所闻所历。林语堂在序言中肯定了《从军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指出这是“战地的真实文字”,故而能被民众注意和欢迎^[4]。

民国作家还认为:日记之所以为文学,是某些日记“尽有文艺的趣味”。

1925年,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提出了日记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其“趣味”的含义是:真正的日记没有做作的痕迹,比一般的文学作品更天然真实、更鲜明表现出作者的个性;日记中的寥寥数语,常常勾画出一个飘逸的形象,日记中不成章节的文句,可能含有不少的暗示力量,日记一行半行的记事,也可能尽有文艺的趣味,一些日记提供了看待人世间的全新视角,让人读来颇有意思;此外,一些日记还是重要的考证资料,审美之外兼具独特的学术价值^[5]。

1926年,鲁迅作《马上日记》“序”,及1926年6月25日、26日、28日的日记,“序”及这三则日记被刊载于刘半农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又写1926年6月29日,及1926年7月1日、2日、3日、4日、5日、7日的日记,这些日记被编为《马上支日记》,刊载于当时由李小锋主编的《语丝》周刊。这些日记因是写给第三者(读者)看的,所以比鲁迅原本写得简略、内敛并略显单调,主要供自己看的所谓“正宗嫡派”日记,明显要详尽周曲、兴致盎然一些。笔者将《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共计十天的日记,与《鲁迅

日记》中同一天的日记进行比对,发现它们中有1926年6月28日、7月6日的日记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鲁迅日记》中的记录过于简略、内敛和单调,只有寥寥77字和68字,而《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中这两天的日记却极尽铺叙,足有上千字之多,文中亦多了颇有趣味的细节和嘲讽性的语言,其中的“鲁迅味”可谓呼之欲出。《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的这十天日记,后来被鲁迅收入他的杂文集《华盖集续编》,足见他认同这些日记属于“文学”范畴。笔者认为,这些日记是颇有“杂文味”的日记,是鲁迅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27年,郁达夫在《日记文学》一文中提出了日记是“文学的重要分支”,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郁达夫熟读古今中外日记,他认为亚米爱儿的日记堪称日记中的精品、逸品,是可以传世到人类绝灭时的不朽之作,他指出:读这样的日记,“比读有始有终,变化莫测的小说,还要有趣”^[1]。这是说,日记虽不是小说,但确有一些日记作品因为作者的生活曲折,缘于实录、不经雕饰,亦有情节跌宕起伏、故事曲折完整、形象鲜明生动的韵味,读来扣人心弦,颇具小说文本的除虚构外的诸审美元素。在郁达夫看来,这是颇有“小说味”的日记,不应该被排除在“文学”的大家庭之外,尽管它不是“正统文学”,却可称之为“文学的重要分支”。由此可见,尽有文艺趣味的日记,不但是“文学的重要分支”,还应该是“正宗嫡派”日记的一个分支。

1929年,林语堂在《冰莹从军日记·序》中说:在冰莹看来“不成文学”的东西,却是“实地描写革命生活的文字”^[4]。谢冰莹为何觉得她的日记“不成文学”呢?据后世学者分析,这是因为初次走上文学之路的谢冰莹深受西方纯文学观念影响,以为自己的日记“没有系统”“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没有经过雕琢”“忽略了战争和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及他们被压迫的描写”,看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让人觉得缺少纯文学的美感。然而,在当时读者,以及孙伏园、林语堂等有见识的编者译者看来,谢冰莹是以战争的参与者、以女兵的独特体验,用手中的笔富有激情地把她所见所闻的事实以及“眼前所看见的这些可歌可泣的现实题材”忠实地写出;写一些当时轰轰烈烈、悲壮伟大的革命故事出来,让读者知道“前方的士气,和民众的革命热情,是怎样地如火如荼”。可想而知,这在当时战地报道缺失的中国,是何等受欢迎!^[6]笔者认为,这是颇有“报告文学味”的新体日记。

总之,民国作家在广泛争议的基础上,达成了他们对日记文学的认同,即:真中见真和尽有文艺的趣味是日记文学的两大特征。他们认同日记是“私密的文字”,发现日记之所以是日记,在于作者的写作方式是系日实录和无意雕琢,内容上时时可见其不轻易示人、比较私密的一面,往往有作者的真面目在;日记之所以是文学,在于其内容中富有形象、情感、意趣等审美元素。可以说,真中见真和尽有文艺的趣味是一些真正的日记被称之为“日记文学”的内在原因。

笔者认为,民国作家的这些认识在实质上提出了日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即:日记的纯正化和文学性问题,表明他们对日记文论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在民国作家看来,所谓日记,是指真正纯正的日记,它没有任何做作的痕迹,比一般的文学作品更天然真实、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因而它不包括以日记形式所创作的虚构性文学作品;“真中见真”作为日记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不是指日记内容的完全真实(从理论而言,日记内容的完全真实因为受到客观条件及作者的认知水平、利益立场等因素局限,事实上是很难达到的),而是强调日记的真形式和日记作者的性情与个性之真,这是一种内在的真和更具价值意义的真;“尽有文艺的趣味”作为日记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明确指出所有的日记并不一定都可以称之为日记文学,只有那些蕴含着“杂文味”“报告文学味”“小说味”等丰富文学意趣的写实日记,才能被称作为日记文学,这种日记不但是“文学的重要分支”,也是“正宗嫡派”日记的一个分支。

三、迥异于正统文学的意趣和风貌

不同的日记中,作者对社会的观察视角是不同的。郁达夫、鲁迅、林语堂等人曾指出日记作者的观察视角极有特点:

从观察精细、且多闲暇的妇人视角,来写当时的家庭琐事,虽然累赘,但能比较正确、完全、精细地把当时的琐事记叙下来,这样日记就成为反射社会风俗的一面镜子^[7]。读这些日记,能感到无上快乐,故为人传颂者多。

从战事中职业的日记者、或任有职务的人等视角,来叙写当时的战事^[7]。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就是北伐前线中任有职务的一位女子军,在战事间隙,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这是局中人内视角叙事,常常有丰富生动的细节和逼近真相的深层事实^[4]。

不同于刻意经营的正统文学,日记往往“从不经意处”,写出这个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这往往是不愿别人知道真实,但要知道这人的全部,这些真实又必不可少^[8]。

.....

可见,因视角的独特,许多被鲁迅称为“非文学作品”的日记,就有了一些“活的”关于个人、关于当时社会的记载^[7],这使枯燥的史实经常生发出引人入胜的文学意趣,日记向来有些读者就不足怪了。

至于在日记中写什么?民国作家的思考和实践如下:

施蛰存在《我的日记》一文指出:记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小故事,记“钱塘夜渔”之类生平未见、偶见之下即目眩心移的劳动场景,记自己倍感享受的自然景色,记自己的思想,以及记银钱进出的账目等,总之,主要记自己觉得有趣的方方面面;记事的地方,文字即使浅陋,因为那事值得回想咀嚼,所以现在翻看仍觉有味;记思想的地方,则因时方弱冠,尽管感想是有感而发、批评是有的放矢,但思想毕竟幼稚,现在读来却颇可笑^[2]。

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牍》中指出:主要记一些能显出“主人的性格”、见到主人“精明的性分”的普通人的生活镜头及当时的社会剪影^[5]。

《鲁迅日记》是鲁迅“写给自己看的”、所谓“正宗嫡派”的日记,这些日记一般不记他所处时代的重大事件,只记日常的人际交往、银钱往来的账目、购书的记录等琐事^[9],这部日记给人一种神秘感,看不出鲁迅说的可以从“正宗嫡派”日记看出一个人“真的面目”、见到他的“真心”这一特征,鲁迅对此也爽快承认。被鲁迅编进《华盖集续编》的,看作是“正宗嫡派”日记的一个分支的《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这是鲁迅专意“记杂感”的日记^{[9][10]},倒可以看到鲁迅冷峻深刻严肃的“思想家”形象下的另一面目,这是一个幽默、风趣、热情、但不失犀利,又带有些许孩子般调皮的普通人形象,这正是鲁迅所说可从中看出一个人“真的面目”、见到他的“真心”的日记。如此而言,鲁迅所谓“正宗嫡派”日记倒应该是指他编在《华盖集续编》的《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了。

郁达夫指出:对作者言,日记主要记自己虽无聊却有起色的生活,因为刻板的生活,连自己看了也要生厌;记自己“苦闷的心史”、内心“矛盾的心理”和灵魂的拯救,以及精细的自我解剖、社会批评的眼光^[1];记自己所受的暗箭和为此做的申剖^[11];记旅行中所见的“新异”等^[7]。尤其记自己“苦闷的心史”、内心“矛盾的心理”和灵魂的拯救,以及精细的自我解剖、社会批评的眼光等内容的日记,它们的一些作者,因为天资极高,同辈以为将来会了不得,一生却平淡无奇、境遇不好,事业文章也很寥寥,几无可以使人怀念他、并使他不朽的东西,他的内心苦闷、精细解剖、对社会的批评,在日记公开后才被人知晓^[1],其日记也因此成为传世之作。

此外,钱钟书在1947年出版发行的小说《围城》中,借主人公方鸿渐的父亲这个形象抨击了民国社会在日记写作上的不良风气。方鸿渐的父亲爱写日记,主要记他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支颐扭颈、行立

坐卧种种姿态”，目的是让别人了解、给自己立传，这样的日记很做作，像“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12]。

可见，日记的内容无论在广度、深度和个性化等方面，都表现了与正统文学迥然不同的风貌。

民国作家为什么要写日记？这有多方面的因素。

其一，为文学修养的提高。当时的舆论认为，日记是“文学修养的模范”“帮助写作的利器”^[2]。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和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在出版界取得极大成功，对民国作家热衷于日记文学也有重要推动作用。一些作者用日记记下自己日常生活中“最美丽”的瞬间，对社会问题发表的感想及时评等，保存了许多富有文学意趣的内容^[2]，客观上对作者审美意识和写作能力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二，为备忘和减轻一个人的苦恼。郁达夫等民国作家都认同鲁迅的观点，承认日记的目的，原本是给自己一个人看的，为减轻自己一个人的苦恼，或预防一个人的私事遗忘而写^[1]。鲁迅指出：他在日记中“记杂感”，是因为害怕忘记，所以一想到、马上记，算作自己每天的“画到薄”^[9]。

其三，为技痒难熬。郁达夫指出：对于自己、对于当时的社会，作者一旦有了某些新认识，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记下来，他认可女作家法尼·排内(Fanny Burney)的观点，认为日记之作，“只有技痒难熬之隐衷，而并无骄矜虚饰，坦白地写下来的关于自己、关于当时社会的日记，才是日记的正宗”^[7]；此外，记行的日记，更是作者“一逢新异，手痒难熬”^[7]的结果。

其四，为保存“活的”考据资料。日记的不少作者，是历史上重要现场的目击者、经历者、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写日记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记下在这些现场中获得的丰富细腻的客观性观察和主观性体验，这是重要的人文记忆，对于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而言有非同寻常的意义^[7]。

其五，为低劣的目的。郁达夫的一位作家友人，写日记的目的十分明了，第一个目的是攻击某先生对日本人所发的议论。某先生的议论是合理的，但这位友人为了标榜自己的爱国，也要在日记中对此大加挞伐。第二个目的，是喊穷喊苦。这位友人是文人中的富者，但他在日记里记自己面临“债主的将来催逼”^[13]，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穷到了无立锥的境遇。另有一批人写日记，是为了让别人了解、给自己立传，其目的也应该归于这一范畴内。

民国作家还认为，日记对作者的主体素养要求很高。

首先，理论认识上要高。郁达夫承认，公开出版、发行自己的日记，确有处于穷途末路、卖私记以糊口养生的考虑；为了补剂生活，他将《日记九种》刊行，刊行之后，销路大好，为了版税，听任书局一版再版；后来，为了应付杂志及书局催逼文稿，也将一些零散的日记交与杂志和书局发表。这样的日记，带给了郁达夫丰厚的版税、轰动的读者效应等一系列客观后果^[11]，在常人看来这背离了郁达夫、鲁迅等一再强调的日记应该“写给自己看的”这个初衷。其实，这种看法是欠全面的。因为郁达夫赢得读者的关键不是他对读者的刻意迎合，其法宝恰在于他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他说：一位好的日记作家，要“养成一种消除自我意识的习惯，只为解除自己内心的重负而写下，万不可存一缕除自己以外更有一个读者存在的心”^[7]。与郁达夫一样，谢冰莹在《从军日记》刊行后也曾特别声明：“当时我写《从军日记》，脑子里根本没有任何希冀，并不想拿来发表”，只是觉得北伐前线发生的可歌可泣的现实故事，不写出来实在可惜，写出来后请孙伏园先生代为保存，是孙先生心有所爱予以发表的^[14]。——读者喜欢此类日记，因为他们能够从中看到一位作家的“真心”“真面目”或这个时代的某些“真相”。

其次，敢于大胆暴露自我。周作人承认自己的修养不够，他说：“我不能写日记，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得，但要写下来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实在是修养不够的缘故。”^[5]鲁迅认为，正宗嫡派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真的面目”，他据此批评了李慈铭、胡适等人，指责他们写日记是专意“给人传观”。然而，在日记理念和实践上，鲁迅的说和做是有距离的。对于自己的日记实践，鲁迅评价说：“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他承认自己的日记与所谓“正宗嫡派”日记有差距^[9]。对于记“杂感”的日记，鲁迅也坦率

承认:“因为这是开首准备给第三者看,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甚至,基于他对人性的怀疑,还向读者提出建议:日记虽“较接近于真实,……但也不能十分当真”,因为“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8]。郁达夫与周作人、鲁迅等人最大的不同,是“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15],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从不藏着、掖着,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个坦诚、真实、全无遮盖的自我形象。笔者认为,具有如此个性的人物,不论知名度的大小,其日记通常会有一批读者,因为日记写出了一个人“真的面目”,这对于读者的成长而言是可贵的资源,有正反及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可见,真正的日记对作者大胆暴露自我的素养要求很高,这方面的不达标也正是一些日记备受诟病的重要根源之一。

此外,作者还要善于编日记^[11],即:将日记中一段时期内的日常生活按进展情况编辑成册,分别冠以标题,看似散乱的日记就会成为有条理、有规律,有一定情节、形象和抒情意味的完整叙事。当然,作者的生活也要有一定起色变化,否则还是难以写出有价值的日记。

总之,民国作家认为:不少日记能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学分支,与作者对社会的观察视角、记录内容、叙写目的、主体素养等因素有极大关联。

四、日记读者的审美阅读期待

至于读者为什么爱读日记?郁达夫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

其一,源于好奇的天性。他说:读者读小说的最大心理动机,是他们对“旁人的私事的探知”和好奇;与此相同,读者喜欢读日记,最大动机之一也是对于“旁人的私事的探知”和好奇^[1]。此后,美学家朱光潜也表示过类似看法^[16]。

其二,源于趣味的追求。郁达夫指出:日记的精品、逸品,作者虽是信手写来,却能把个人生活的原原本本、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内心世界的细微骚动,个人内心的矛盾冲突及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等,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纤毫毕现;这对读者而言,虽没有虚构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却让人觉得“比读有始至终,变化莫测的小说,还要有趣”^[1],因为这些日记虽无小说之名,却有小说之实,即:它们有高度写实的生活叙事,与小说的情节一样有始至终、变化莫测,更重要的是它们的人物形象与小说不同,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自我”,有时候这种形象更有典型意义,也更具人生的借鉴价值。郁达夫的著名日记《日记九种》即是如此。这部日记与郁达夫的其他日记不同,名为九种,即:《劳生日记》(1926年11月3日-11月30日)、《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日-12月14日)、《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1月31日)、《穷冬日记》(1927年2月1日-2月16日)、《新生日记》(1927年2月17日-4月2日)、《闲情日记》(1927年4月3日-4月30日)、《五月日记》(1927年5月1日-5月31日)、《客杭日记》(1927年6月1日-6月24日)、《厌炎日记》(1927年6月25日-7月31日),但实际上是郁达夫一段特殊时期生活的完整记录,它分为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三大阶段和九个节点。其一,广州阶段。生活的主题词是“劳生”“病闲”,此时郁达夫远离旅居北平的妻儿独居广州,任职广州国民政府举办的中山大学,但他对国民政府的右派行径极为不满,故托病请辞。这是郁达夫内心世界的低潮期。其二,上海阶段。生活的主题词是“村居”“穷冬”“新生”“闲情”“五月”。此时,郁达夫从广州迁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事务。这个阶段,远离妻儿独居上海的郁达夫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竟觉得发现了生命中的光明,对王映霞展开了疯狂热烈的追求。中间经历了自我内心的种种矛盾,以及与王映霞女士的矛盾冲突、与创造社内部的矛盾冲突、与外国殖民者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反动派的矛盾冲突等。这个阶段的日记生动细腻地展现了一位极富个性、极有追求的著名作家的内心隐秘,表现了他的事业心、他的文学追求和理念、他在生活泥潭的挣扎、他对摆脱无爱婚姻的愧疚、他对爱情的认知和渴求、他对旧派文人林琴南的不齿、他对自我瞬间隐秘心理的自嘲等。可贵的是,他的日记还无意中客观记录了一些当代军政事件在上海平民生活中的投影,比如他在去见王映霞的路途中,亲历和目睹

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屠杀上海工人的街头现场,并痛苦发出了自己的诅咒。可见,该部日记是一部融合了时代投影和个人心史,兼具时光惊心动魄和个人恩怨情仇的日记文学巨作。其三,杭州阶段。生活的主题词是“客杭”“厌炎”。此时,郁达夫离开血雨腥风的上海,与王映霞回到家乡杭州,住在西湖附近,过上了神仙眷侣般的杭州风情生活。这是郁达夫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笔者认为,《日记九种》的情节跌宕起伏和形象鲜明生动完全不输于许多有成就的小说,那些认为“郁达夫的日记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有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自我”^[17]之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这不符合郁达夫的日记理念和实践。

此外,读日记还可以帮助读者消磨无聊的时光,郁达夫曾说:阅读日记,让他“消磨了许多无聊赖的黄昏”^[17]。

对于读者为什么爱读日记,鲁迅认为要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尤其是古今读者有较大区别。

首先,他承认一个事实:日记这类“非文学作品”向来是颇有读者的。

其次,他认为古人爱日记,根本原因是他们能从日记中读到了一些有见识的文人对于“朝章国故”的记载,可以长知识、增见闻;或是因为日记中收藏的佳作——中国文士历来喜欢将自己的佳作收进日记里,读者可以从这些佳作学习“丽句清词,如何抑扬”的写作技巧;或是因为有名望的作者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些如何钻营、如何请托的“成功经验”,读者可以从中学习“怎样请托”^[8]。总之,这是将一些日记当教科书用。

其三,他认为今天的人们喜欢日记,主要是将日记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资料,他说:现在的人们,读文人日记,目的已经比较欧化,“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并指后者是最重要的^[8]。

综上所述,以郁达夫、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人为代表的民国作家围绕“日记文学”的相关话题(如民国日记兴起的缘由,日记文学的特征,日记写作的视角、内容、目的和主体素养,以及读者观等)展开了多年的争鸣和讨论,形成了一些共识,初步建构了他们关于“日记文学”的理论。

[参 考 文 献]

- [1] 郁达夫. 日记文学[M]//海上文学百家文库:郁达夫卷.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461-466.
- [2] 施蛰存. 我的日记[M]//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77-80.
- [3] 鲁迅. 怎么写——夜记之一[M]//三闲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0-22.
- [4] 李怡.《从军日记》与民国“大文学”写作[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 [5] 周作人. 日记与尺牘[N]. 语丝,1925(17).
- [6] 谢冰莹.《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前言[M]//谢冰莹作品选.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717-721.
- [7] 郁达夫. 再谈日记——《郁达夫日记集》代序[M]//炉边独语.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304-307.
- [8] 鲁迅.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牘钞》序[M]//且介亭杂文二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09-210.
- [9] 鲁迅. 马上日记[M]//鲁迅杂文 华盖集续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5-126.
- [10] 鲁迅. 马上支日记[M]//鲁迅杂文 华盖集续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38.
- [11] 郁达夫.《日记九种》后叙[M]//炉边独语.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293.
- [12] 钱钟书. 围城 人·鬼·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54.
- [13] 郁达夫. 有目的的日记[N]. 申报·自由谈 1933. 7. 23.
- [14] 林语堂. 冰莹从军日记·序[M]//从军日记. 上海:春潮书局,1929:9.
- [15] 郭沫若. 论郁达夫[M]//郁达夫研究资料.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86.
- [16] 朱光潜. 日记——小品文略谈之一[M]//谈读书.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33-134.
- [17] 谢泳. 两种日记的比较研究——读鲁迅郁达夫日记札记[J]. 鲁迅研究月刊,1992(9).

The Controversy of "Diary Literature" about the Write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Zhongli

(College of Arts ,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1331 , China)

Abstract: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al writers , such as Yu Dafu , Lu Xun , Lin Yutang , Xie Bingying , had debated and discussed around the topics related to " diary literature " for many years , and initially built their theory of diary literature . It is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diary literature that it is the true contents from true forms and the taste of literature and art . Diary can become a very distinctive branch of literature , and it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s view of the society , the content of the record , the purpose of the narration , the quality of the subject and so on . Readers love to read the diary , mainly due to their curious nature and the pursuit of interest ; in terms of specific circumstances ,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readers .

Keywords: Yu Dafu ; Lu Xun ; the write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diary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 孟西]